



世纪抉择

中国命运

林衢 / 主编

- ★道路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思想灵魂：要不要马克思主义？
- ★世纪基调：新文化？旧传统？
- ★救亡图存：改良还是革命？
- ★祖宗之法：不变？变！

大论战

时事出版社

改变中国命运的
战

- ★科玄之争：科学能否解决人生问题
- ★守护文学：革命的抑或自由的？
- ★把脉国情：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
- ★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我们的态度！
- ★国共之间：对中国命运的最后搏战

世纪抉择：

中国命运大论战

第四卷

林衡 主编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林衢编著. -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09-433-2

I. 世… II. 林… III. 辩论-中国-文集 IV.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7943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0 印张 字数：19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98.00 元 (全四卷)

第九编

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我们的态度！

——延安整风与文艺整风

王 明 现在，根据四中全会后新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

毛泽东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

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象不象？

毛泽东

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

张闻天 我想，我这次所走的途径，或许是改造象我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党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吧。这就是说，首先应该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如关于“知识分子”与“理论家”之类的错误思想，然后使他们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使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向的正确，决心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

毛泽东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王实味 当前革命的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

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它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沾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底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的手段。

周 扬 他要求艺术家向政治家，向那些他在《野百合花》里所直率地称呼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的，“异类”的人们瞄准，实践他所主张的枪口对内论。鼓动艺术界的力量，青年的力量来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这就是浸透在王实味的每篇文章，每句话，每个字里的精神实质。

背景

1942 年春，延安。

领导着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毛泽东，一面领导着抗日战争，也在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党在成立的 20 多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历了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王明的错误分别在遵义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纠正过，但党的历史没有系统地总结过。党内的指导思想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不少人不是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而是主观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

抗日战争处于空前困难的境地，中国共产党能否制订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取得抗战的胜利，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 80 万党员，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

如果不能使党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一致，解决上述问题，夺取胜利就谈不上。毛泽东对他的战友说，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

尤其是王明虽然口头上承认了错误观点，但实际上仍在坚持他的错误观点。1940 年 3 月，王明将其写于 1931 年的集中地反映了他“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在新版序言中他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

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一挑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理论上的。

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

王明的小册子印行后，毛泽东就开始收集、研究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没有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当他把自己的认识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出来时，许多党的干部对王明这种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者的面目认识不清，有些同志不同意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的提法，认为只是策略的分歧。这表明全党在路线是非问题上还缺乏统一的认识。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血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分析：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革命内战的蒋介石，不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革命就要遭受失败的挫折。

必须在全党的范围内进行一场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打破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打破党内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思想上武装全党，战胜困难。

于是就有了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大体经过三个阶段：

一、1940年12月毛泽东发表《论政策》至1942年初，为整风的准备阶段；

二、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到1943年，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

三、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是高级干部整风总结阶段。

1941年3月，毛泽东在出版他于1930—1933年间所作的农村调

查时写道：“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这一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这种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天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他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1941年9月10日—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指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强调“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会上，许多人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

博古（秦邦宪）自我批评道，“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

王稼祥总结主观主义的产生说，“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王明不肯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责任者。

继而，王明又就抗战以来党的方针同中央进行争论，于是，毛泽东决定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而王明又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被历史学家称为“九月会议”的这场会议，使党的领导层对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取得了大体一致的共识。

此后，中央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在毛泽东的精心组织下，从1941年冬开始，全国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是从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后开始的。

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脱离的党内教条主义。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这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关于党八股，他认为这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整风的操作步骤是，学习研究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然后联系实际，检查思想与工作，研究历史，进行严肃而又实事求是的相互批评；进而再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明辨是非；最后单位和个人都写出思想总结。

党内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开展起来。

在全党整风的同时，延安文艺界暴露出不少问题。那些满怀救国热情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没有作好与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准备，“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在文艺界内部，也存在着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和不团结现象，还存在着宗派主义的问题。

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文章，对延安存在着的一些缺点进行批评；并提出文艺要批评社会阴暗面：“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

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底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

王实味的言论被国统区的反动派收集后，编成攻击延安根据地的小册子，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解放日报》副刊主编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由延安妇女的问题对延安存在的缺点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他认为王实味“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提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他对丁玲诚恳地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了解了情况，决定以座谈会的方式来解决文艺界的种种问题。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同延安的一批著名的文艺工作者坐到了一起。

毛泽东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经过热烈的讨论，5月23日，毛泽东又做了总结发言。他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他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还强调，“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地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

解放区的文艺界，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以延安为中心，也开展了整风运动。

文艺整风是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插手，王实味的问题很快升格为政治问题，后来又将其定为“托派”，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1947年经康生领导的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造成了一起冤案。直至八十年代后，王实味冤案才得以平反。

尽管整风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经过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党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被解放出来，党内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党普遍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掌握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和方法，使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上成熟、政治上统一、组织上团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而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

王 明 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 维克化而斗争*（节选）

（一九三〇年冬）

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

一 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要想正确地懂得和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政权、领导权及前途问题，首先便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国家一切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铁路、矿山、银行、航业、重要工业等）都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迂回、畸形的形态之下发展着，而且主要地只限于一部分轻工业（纱厂、丝厂、面粉厂等）并对于帝国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形式侵入经济生活，另方面还保有封建剥削关系的优势。经济系统是

* 本文节选自《王明言论集》。1930年王明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旗下，以教条主义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写成《两条路线底斗争》，1932年再版时改现名。

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首先表现在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上：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农民收获品付给地主作地租、非经济剥削等等）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都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叛徒罗易之流的“非殖民地化”的理论，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见反对派刊物《动力》第一期）“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封建残余已经没有，或只是残余的残余。”这不过是歌颂“帝国主义送给落后民族以兴盛、进步和文明”的社会民主党的应声虫！他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躲藏在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左的”假面具之下，实行取消了中国以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同时，即是取消了一切革命。立三同志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代表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认识的另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即是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他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公开地拥护“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的理论，他不了解他这一经济分析的危险是否否认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事实，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否认了乡村中阶级分化（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过程，结果不仅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不仅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并且根本取消了现在阶段的反帝国主义与土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